

· 文献之窗 ·

关于汉文旧档《各项稿簿》

谢肇华

沈阳故宫长期收藏的皇太极时期的汉文旧档共有三部五册，即《各项稿簿》一册、《奏疏稿》一册、《朝鲜国来书簿》三册，均为当时往来文书的誊写本。1905年，日本内藤湖南氏在沈阳故宫曾对该三部档案逐页晒蓝复印。1924年，罗振玉编《史料丛刊初编》，曾选录该档案的若干部分。此后，史学界均称该档案不知所终^①。

1994年末，笔者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读了内藤氏当年的晒蓝本，始对这批旧档的全貌有所了解。1995年末，笔者又在大连市图书馆，有幸查到一函《朝鲜国王来书稿》写本一册，附《各项稿簿》写本一册。经与内藤氏的晒蓝本比较，笔者认定，大连馆藏本即是史学界寻觅半个多世纪的沈阳故宫原藏本，但已经严重残缺。现仅对《各项稿簿》作一概述。

一、大连馆藏《各项稿簿》与内藤氏晒蓝本之异同、优劣

二者的唯一差别在于封面，晒蓝本在左上方书名《各项稿簿》下，尚写有“共五十七页”五个小字，而大连本无；晒蓝本在封面正中，还竖写一行小字，为“天聪二年九月初一日立”，而大连本则是两行，为“天聪二年九月初一日起至五年十二月”。晒

蓝本是照原书晒图，纸呈蓝色，字呈白色，当为原貌，大连本的封面显然是后人所写。

二者在四个方面则完全吻合：1. 长宽吻合，均为 32 厘米长、18.4 厘米宽；2. 每页纸的纹路吻合，大连本为竹纸，每页有横纹 31 道，晒蓝本照出的横纹也为 31 道；3. 每页行数、每行字数吻合。由于当时尚属清朝的草创阶段，制度尚不完备严格，故每页行数不等，少则 6 行、多则 10 行。每行字数也不等，少则几字，多则 30 余字，但一般为 30 字左右。虽每页行数、每行字数不同，但晒蓝本与大连本在相应之页上，行数和字数是完全一致的；4. 字迹吻合。《各项稿簿》为当时往来文书的录副，誊写人不一，字迹也各异，但晒蓝本与大连本在每个字上都完全吻合。据此断定，1905 年内藤氏在沈阳故宫晒蓝之底本，即为今大连市图书馆所藏之本。

内藤氏晒蓝本与大连现存本各有长短。晒蓝本基本上是完整的，其封面注明“共五十七页”、右下角标为“一”，正文首页标为“二”，最后一页标为“五八”，中间缺三〇、五〇、五一，这样算来，晒蓝本连封面共为 55 页，封面背面有文字，“五八”页背面无文字，实有文字者为 109 面。中间虽缺 3 页，但“二九”页背面刚好为一件文书的结尾，“三一”页正面正好是天聪五年的开始，所缺之“三〇”页并不影响前后文书。“四九”页背面也刚好是一件文书的结尾，“五二”页正面刚好是《岛中刘府来书》的开头，所缺之“五〇”、“五一”二页，也不影响前后之文书。这是晒蓝本优长之处。

晒蓝本的不足之处是，由于当时晒蓝景照技术水平所限，加之又时过 90 年之久，致使不少字迹已模糊不清，难以辨认。虽经日本学者辨识，在旁以朱笔标注，由于有臆测之成分，有些标注反倒与原字原义相违。仅举几例，以为说明。其一，第 45 页下倒数第 1 行，原文为“土蛮、哈喇勤”，“勤”字景照模糊，朱笔将

其误标为“勒”字。其二，第46页上第6行，原文为“自撞晚钟将毕，城门、关门俱要封锁”，“毕”字与城门的“门”字景照不清，朱笔将其误标为“军”和“闷”，成为“自撞晚钟将军，城闷关门俱要封锁”。这都是由于对中国的历史、民族部族、制度等不够熟悉，只从字形臆断，造成的错误。其三，第49页下第8行，原文为“前定例多不过二十七器”，朱笔将“过”字误标为“通”字。其四，第53页上第5行，原文为“姑待明春”，朱笔将“待”字误标为“得”字。这都是因为对汉语还有隔膜，只从字形臆断，而造成文义不通。其五，第53页下第五行，原文为“秉心归正”，朱笔将“秉”字误标为“诚”字。这是从文义上顺下来的，但也与原文有违。类似性质的误标是不少的。

大连现存本虽距今已有360余年，纸已变黄变暗，但墨迹依然清晰，晒蓝本的模糊问题、误标问题，它是不存在的。但是，大连现存本残缺严重，除缺三〇、五〇、五一这3页外，还缺以下几处：1. 自十八页上面第2行起，包括十八页下面，至十九页上面第1行，大连本全无，而是将十九页的第2行紧贴于18页第1行之后。2. 第二三页上面。3. 第三三页上面。4. 第三九页上面。5. 自五七页上面第3行起，包括五七页下面，至五八页上面。这当然要脱漏不少内容，这是大连现存本的最大缺憾。

二、大连本的收藏经过及残缺原因

原藏沈阳故宫的《各项稿簿》，同其他两部汉文旧档一样，在清入关后，曾被移送北京，以资编修《太宗实录》，这已为《太宗实录》采用三部汉文旧档的部分记载所证明。其后，三部汉文旧档又被送回沈阳故宫保存，这更为1905年内藤氏在沈阳故宫晒蓝景照所证明。

笔者以为，1905年以后，1911年以前，三种汉文旧档曾被再次移送北京内阁大库。证据之一是，1921年，北平历史博物馆

“清理内阁大库档案，得抄本清太宗朝与高丽往来诏谕书表一册，自崇德元年五月起至崇德六年八月止”^②。其中朝鲜国王来书只能抄自旧档之一的《朝鲜国来书簿》，这很有可能是1905—1911年之间所抄，当然也不排除是三种旧档在清初第一次移送北京时所抄。如果说这一证据还不足以说明三种旧档第二次移送内阁大库，那么证据之二便具有不可怀疑性。这就是在1922年2月，罗振玉曾用巨款，从北京西单大街同懋增纸店，买回了上年末被历史博物馆处理掉的原内阁大库的一批档案^③，又特建“库书楼”存放，并于1924年从这批档案中选编了《史料丛刊初编》，其第一册中的《太宗文皇帝致朝鲜国书》、《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帖》，就是从《各项稿簿》中辑出的。这是罗振玉对文化事业的一大功绩。1928年，罗振玉将这批档案带到大连，后来才为大连市图书馆收藏^④。由于这批档案比较残缺，又整理迟缓，因而长期被埋没，至有“下落不明”之说。

大连现存本严重残缺，可能有两个原因。一是清末内阁大库失修渗漏，档案屡经迁移。民国初年又移于国子监，1916年又移于午门，1921年这部分又被卖给同懋增纸店。同懋增纸店库房不大，又打算将其送定兴县纸坊重造粗纸，当然不会善加保存。这种残缺，就是在这多次转移中造成的，这是主要原因。二是罗振玉主持编辑《史料丛刊初编》事出突然，又缺少足够的熟练的专业人员，1922年初购得档案，1924年初就筛选、整理、编辑、刊刻出22种，难免不出现纰漏，包括移花接木、丢失页数的失误。

三、《各项稿簿》的价值

《各项稿簿》收录天聪二年九月至五年十二月后金各类往来文书86件，涉及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宗教、外交、民族等许多重要问题，是研究当时历史的珍贵的第一手文献。

可惜，此书并未在社会上刊布流传。顺治初年，修《太宗实

录》，虽参考了此书，但据笔者统计，仅选用本书 11 件资料。罗振玉虽依本书编了《太宗文皇帝致朝鲜国书》、《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帖》两个专题资料，选用资料达 46 件，但其他内容广泛的 40 件资料却无法入选刊印。《各项稿簿》正可以补充《太宗实录》、《史料丛刊初编》的缺项。现将《各项稿簿》的各件与《实录》、《初编》对照如下：

序号	《各项稿簿》内容	《太宗实录》	《史料丛刊初编》
1	天聪二年九月初三日，金国汗致朝鲜国王书	失 载	编 入
2	天聪二年十月二十一日，金国汗致明毛大将军书	失 载	编 入
3	天聪二年十月二十七日，送原拿获来人二十名名单	失 载	未编入
4	天聪二年十一月一日，送原拿获来人五名名单	失 载	未编入
5	天聪二年十一月二日，送原拿获来人十一名名单	失 载	未编入
6	天聪二年十一月八日，金国汗致朝鲜国王书	失 载	编 入
7	天聪二年十二月八日，送原来人十三名名单	失 载	未编入
8	天聪三年元月九日，送原抢来台军七名名单	失 载	未编入
9	天聪三年正月十五日，敕谕八固山贝勒	失 载	未编入
10	天聪三年二月十日，八旗大臣等祷告天地誓状	载	未编入
11	天聪三年二月三十日，金国汗致朝鲜国王书	失 载	编 入
12	天聪三年三月七日，敕谕各汉官	失 载	未编入

续表

序号	《各项稿簿》内容	《太宗实录》	《史料丛刊初编》
13	天聪三年三月二十三日,传谕金汉蒙古军民人等	失 载	未编入
14	天聪三年六月十一日,敕谕官生军民人等	载	未编入
15	天聪三年七月六日,敕谕岛中明将	失 载	未编入
16	天聪三年八月二十三日,敕谕各城屯堡秀才	载	未编入
17	天聪三年九月二十三日,致朝鲜国王书	失 载	编 入
18	天聪四年三月八日,致朝鲜国王书	失 载	编 入
19	天聪四年五月十六日,致朝鲜国王书	失 载	编 入
20	天聪四年三月八日,与刘三弟兄谕帖	失 载	编 入
21	天聪四年二月十四日,发各岛谕帖	失 载	编 入
22	刘兴贤家信	失 载	编 入
23	刘兴贤家信	失 载	编 入
24	刘兴贤家信	失 载	编 入
25	天聪四年四月,金国汗致朝鲜国王书	失 载	编 入
26	天聪四年四月二十八日,金国汗与刘府列位弟兄书	失 载	编 入
27	天聪四年五月十六日,金国汗致朝鲜国王书	失 载	编 入
28	天聪四年五月十八日,金国汗与刘府弟兄书	失 载	编 入
29	金国汗与刘府弟兄书	失 载	编 入
30	刘兴贤家信	失 载	编 入
31	天聪四年六月二十日,敕谕静安堡刘千总	失 载	编 入

续表

序号	《各项稿簿》内容	《太宗实录》	《史料丛刊初编》
32	天聪四年七月十一日,金国汗与执政众王盟誓	失 载	未编入
33	天聪四年七月二十五日,敕谕游击李献箴	失 载	未编入
34	天聪四年八月,金国汗与刘府弟兄书	失 载	编 入
35	天聪四年八月六日,金国汗致朝鲜国王书	失 载	编 入
36	金国汗致朝鲜国王书	失 载	编 入
37	金国汗致朝鲜国王书	失 载	编 入
38	金国汗致朝鲜国王书	失 载	编 入
39	天聪四年八月,敕谕永平迁滦等处军民	失 载	未编入
40	天聪四年九月一日,金国汗与岛中刘府列位书	失 载	编 入
41	刘兴贤家信	失 载	编 入
42	天聪四年十月三日,金国汗致朝鲜国王书	失 载	编 入
43	天聪四年十月十三日,敕谕各官	载	未编入
44	天聪四年十月二十八日,金国汗与刘府列位书	失 载	编 入
45	天聪四年十一月二日,敕谕黄旗下旗鼓该官人民	失 载	未编入
46	天聪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,敕谕各堡官民	失 载	未编入
47	天聪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,敕谕查僧尼官	失 载	未编入
48	天聪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,敕谕各寺僧众	失 载	未编入

续表

序号	《各项稿簿》内容	《太宗实录》	《史料丛刊初编》
49	天聪四年十二月六日,敕谕城守官祝参将	失 载	未编入
50	天聪五年正月四日,金国汗与岛中刘家兄弟书	失 载	编 入
51	刘兴贤家信	失 载	编 入
52	天聪五年正月二十日,敕谕国中汉人	失 载	未编入
53	天聪五年正月二十一日,敕谕驸马总兵佟养性	载	未编入
54	天聪五年正月二十一日,敕谕众将官	载	未编入
55	天聪五年正月二十三日,金国汗致朝鲜国王书	失 载	未编入
56	天聪五年正月二十三日,敕谕僧录司	失 载	未编入
57	天聪五年正月二十三日,敕谕八僧纲司	失 载	未编入
58	天聪五年二月五日,金国汗与刘府列位兄弟书	失 载	编 入
59	刘兴贤家信	失 载	编 入
60	天聪五年二月十六日,金国汗致朝鲜国王书	失 载	编 入
61	天聪五年三月一日,敕谕靖安堡民孟安邦	失 载	未编入
62	天聪五年四月二十三日,与朝鲜会宁府书	失 载	未编入
63	天聪五年五月二日,敕谕道录司	失 载	未编入
64	天聪五年五月二十七日,金国汗致朝鲜国王书	载	编 入
65	天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,敕谕金汉官民人等	载	未编入

续表

序号	《各项稿簿》内容	《太宗实录》	《史料丛刊初编》
66	天聪五年七月二十五日,敕谕诸将领	载	未编入
67	天聪五年闰十一月一日,敕谕金汉蒙古官员	载	未编入
68	天聪五年闰十一月二日,金国汗致朝鲜国王书	仅提及	编 入
69	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八日,敕谕礼部	载	未编入
70	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十一日,敕谕兵部	失 载	未编入
71	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十一日,敕谕者家堡人民	失 载	未编入
72	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十一日,敕谕新城所堡人	失 载	未编入
73	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十三日,祖大老爷谕明朝归顺金国兵丁	失 载	未编入
74	天聪五年闰十一月二十四日,金国汗致祖大将军书	失 载	编 入
75	天聪五年闰十一月二十四日,祖家弟兄三人及魏相公稟稿	失 载	编 入
76	天聪五年闰十一月二十四日,祖大寿之原副参游击稟稿	失 载	编 入
77	天聪五年十二月九日,金国汗致朝鲜国王书	失 载	编 入
78	天聪五年十二月二十日,敕谕礼部	失 载	未编入
79	天聪五年十二月二十日,敕谕礼部	失 载	未编入
80	天聪四年七月二十三日,刘兴治等与金国汗等盟书	失 载	编 入
81	天聪四年八月,刘兴治等稟金国汗书	失 载	编 入
82	天聪四年九月,刘兴治等稟金国汗书	失 载	编 入

续表

序号	《各项稿簿》内容	《太宗实录》	《史料丛刊初编》
83	天聪四年十月,刘兴治等禀金国汗书	失 载	编 入
84	天聪四年十二月,刘兴治等禀金国汗书	失 载	编 入
85	天聪五年正月,刘兴治等禀金国汗书	失 载	编 入
86	天聪五年二月,刘兴治等禀金国汗书	失 载	编 入

还应指明的是,《各项稿簿》的行文,基本是当时的口语,《太宗实录》虽录用其 11 件,但已改为文言,不免失去其古朴原貌。

《各项稿簿》的另一价值,是能够纠正流传甚广的《史料丛刊初编》的讹误。经笔者粗略校勘,《太宗文皇帝致朝鲜国书》有十多处错误;《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帖》,有大小错误近二十处。仅举数例:例 1,《太宗文皇帝致朝鲜国王书》“其八”,罗本标注为“四年五月十八日差李世武同来人何尽孝赍去”。对照《各项稿簿》,这封给朝鲜国王的书信,其标注为“天聪四年五月十六日与原来官宜若海同差金官东南明赍去,内带前祝参将未发去一书、黑貂十张、紫貂百张”。罗本的标注,时间错了,所差人错了,对象也错了,五月十八日李世武、何尽孝实际是去皮岛送信给刘府兄弟。例 2,《太宗文皇帝致朝鲜国王书》“其十三”,是天聪五年二月十六日,罗本在信后,又附上 12 行文字,为:“又带去一帖 庆兴弥玉家男人一 彦长家女人二……”验证《各项稿簿》,罗氏附加的这 12 行文字,乃是四月二十三日与朝鲜会宁府之帖。例 3,《太宗文皇帝致朝鲜国王书》“其十五”,罗本标注为“四年闰十一月初二日,差库叉大人赍去”。对照《各项稿簿》,是天聪五年,原注为“差库儿叉大人等赍去朝鲜国王书礼”。像闰月在四年还是在五年的问题,查阅万年历是可以弄清的,但前述张冠李

戴、移花接木式的错误，设若没有《各项稿簿》，是永远也不会发现和纠正的，这就尤其显得《各项稿簿》是多么珍贵了。

注：

① [日本]原觉天：“汉文旧档三种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，不知什么时代被人拿走了，下落不明。”（《奉天古典资料考》，1940年出版）郑玉英：“罗振玉编《史料丛刊初编》时，仅将《奏疏簿》（谢按：应为《奏疏稿》）一册收入丛刊，定名为《天聪朝臣工奏议》。我们这次编辑《清初史料丛刊》时，拟将《各项稿簿》一册、《朝鲜国来书簿》三册也一并编入。经多方查询，……至今下落不明，现已无法排印。”（1980年辽宁大学历史系编“清初史料丛刊”第四种，《天聪朝臣工奏议》前言）佟永功、关嘉禄：“珍贵的汉文旧档后来竟不知去向，甚属可惜。”（《明清档案与沈阳故宫》，载《沈阳故宫文集》，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）

② 《满清入关前与高丽交涉史料》小引，载国学文库。

③ 据1922年即参加故宫明清档案整理工作的郑天挺《自传》，系用12000元买回80麻袋档案。见《郑天挺纪念文集》，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。又，《史料丛刊初编》载王国维《库书楼记》云，罗氏当年以13000元，购得7千麻袋档案，约15万斤。

④ 关于该档的收藏情况，在1996年9月沈阳故宫建博物院70周年学术会间，日本中见立夫先生告余：30年代该档仍藏于沈阳故宫，缘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东洋文库曾托金梁在沈抄写一套。其流入满铁大连图书馆当在40年代。此为一说，谨录于此。然此说余有不解之处：东洋文库抄本在后，为何反倒较为完整？罗的印本在前，为何残缺严重？而且又和现在大连藏本在残缺地方一致？希识者教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辽宁省社会科学院